

中華學術叢書

柳存仁著

和風堂文集

中華學術叢書

柳存仁著

和風堂文集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中華學術叢書

和風堂文集  
(全三冊)

柳存仁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57.75 插頁 17 字數 1,284,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

ISBN 7-5325-0904-6

I·141 精裝定價：35.90元

## 小說的時代與真偽

在拙著的《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的許多篇中文書目提要裏，除了關於這些倫敦藏的小說的版本問題之外，還普遍地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有些作品或刻本的時代是否靠得住的問題。自然，有許多書是中國小說史的名著，像《水滸》、《三國》、《西游記》、《紅樓夢》之類，這些巨著幾乎每一種都有人做過很詳盡的專題研究，如《紅樓夢》，關於它的討論到今天都還時時熱烈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學者。然而，還有許多不像它們那麼著名的書，對於其刊刻的時代，版本的淵源，序文的真偽，作者確爲其本人抑出書買墓名者的依託，通常就不那麼受人注意。現在我以爲我或者可以利用這個適當的機會，儘可能地把若干在這些書籍上面已經發生的這類問題，利用推理和實證的方法加以澄清。下面舉的例證，把它們彙合在一起看，也許可以說明一點這一類問題的考據方法。

### 考證一書的時代

我先舉一部以唐代的英雄事蹟爲故事骨幹的《說唐演傳》（《新刻增異說唐全傳》）爲例。這書的刻本有（a）一七八三刊本，（b）善成堂刻八卷本，及（c）倫敦所藏的聖德堂刻十四卷本（約一八〇一）。後二者都是沒有刻年份的。據我的觀察，這個聖德堂本，其梓行可能在善成堂八卷本之前。怎

樣證明呢？我的著重之處有兩點：一是它的分卷方法參差不齊。卷一至卷十三，每卷各五回，最後第十四卷則爲三回。而且它的回目，文字也不很整齊。一是在善成堂本方面，它的各回回目，却已一律是整齊的七言句了，而且改題書名爲《說唐前傳》，這一定是在有了《說唐後傳》那些後起的著作之後，才把原書改名，以便前後對稱的。《說唐後傳》較早的刊本爲一七六八，似在《前傳》之前，但這祇是就我們今天所見的刻本而言，並不是指它們最初的祖本。

現在，讓我們單談《說唐演傳》罷。孫楷第先生以爲它是以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褚人穫編的《隋唐演義》爲藍本的，而文字却較後者爲「粗獷」（《通俗小說書目》頁四五）。我從文字上去判斷，覺得它的「粗獷」的文字，必定成於《隋唐演義》之前，雖然《隋唐演義》（有褚氏一七一九序）遠比現存它的最早刻本（一七八三）爲早。在我之前，鄭振鐸先生早已從故事情節上指出此書的編寫絕不會在《隋唐演義》之後的，其積極的證據是：

此書第四十四回敘李世民（唐太宗）被囚於李密獄中。李密大赦天下的詔書上，註明「不赦李世民」，而魏徵、徐茂公却將「不」字豎出了頭，下添一畫，改作「本」字，因此世民得以出獄。（《隋唐演義》却說魏徵他們商量，改「本」字不妥，只得由徐義扶帶了世民逃走。這又顯然是褚人穫看了《說唐（演）傳》之後才如此說的。（《中國文學研究》，第二卷，《中國小說提要》九）

我因爲鄭先生的看法很合情理，所以在《說唐演傳》的中文提要中便直捷了當地引用了他的主張。但是，像上述這一個例的後段那樣「已有定讞」的情形，是極少的。我特別把它舉在前面，是希

望讀者們了解這樣性質的考證，有許多還在推測的階段，其能够像那樣有決定性的證據的幸運並不多。但我們的推理，必須力求其觀察仔細，處處跟著證據走，而不爲個人的成見所蔽，並且要常常從和自己的假設相反的那一方面著想，不要一相情願地只是儘量爲自己所希冀的方面辯護。只有這樣，我們下的推斷或者還不致於武斷。

倫敦的藏書中有一部《夏商合傳》。這是《有夏誌傳》和《有商誌傳》兩書的合刊本，一八一四年稽古堂刻的。《有商誌傳》這部書的明刻本現在見不到，也有人疑心這書根本沒有明本。但《有夏誌傳》的明刻本卻是有的，藏日本內閣文庫，與一八一四稽古堂《夏商合傳》的文字相同。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在中國刻印這種通俗小說的書是不會注意到日本藏的中國小說，也不可能得到這種小說的，勢必另有他們所據以刻印而現在却已佚失的早期刻本或明本。如果我們刻的《合傳》中《有夏誌傳》的部分不假，那麼《有商誌傳》應該也不會是假冒的。

《合傳》本《有商誌傳》卷二至卷四，全部是講的商紂末年的荒唐腐敗和周武王伐紂的故事，有許多地方和兩部明代的小說相同，一部是《列國志傳》卷一，一部是著名的《封神演義》。《封神演義》有一部分文字、詩句是承襲《列國志傳》卷一而稍加修改的，我以前曾經把兩者逐一對勘比較過，這個結論是無可否認的了。但是現在我又發現《有商誌傳》卷二至卷四的全部十八則標目，有百分之九十又與《列國志傳》卷一的標目相同，但文字却較《列國志傳》簡略。從上下文比較，很明顯地看得出它是刪節《列國志傳》的文字而成的。

但是它不止承襲《列國志傳》，有些詩句，它不是襲用《列國》而是抄襲《封神》。足見這部書的編成，無疑地又在《封神演義》完成、且有了刻本問世之後。這樣，我們可以假定：《有商誌傳》這部書最早的明刻本可能產生的時間。

上面這一節的詳細考據，是要利用這三種不同的書加以文字對勘，才能够看出推斷的線索有沒有了節，或究竟在文字方面能否找出這個結論的真憑實據的，細心的讀者不妨檢查拙著《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中文部分《夏商合傳》提要的原文。但下面我所供給的幾條例證，它們的性質都是很相像的，並且，大概不需要重對原文，也可以判斷這裏的推理準確不準確。

## 刻本的年月

明末遺民董說撰的《西游補》，清初的刻本載有「癸丑孟冬，天目山樵序」，癸丑不知道是那一年。但序文中引及《西游真詮》這部小說，後者最早的刻本為一七八〇，則此癸丑自當一七八〇以後，最可能的是一七九三（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朝鮮藏明金陵周氏萬卷樓本《包孝肅百家公案演義》，有完熙生一序作於丁酉。這丁酉也不知道是何年，孫楷第先生說「疑即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通俗書目》頁一一一），但沒有說明他的理由。我可以舉一個證據來支持他。萬卷樓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刻於一五九一，所以這個一五九七應該是沒問題的。

《說岳全傳》，英國博物院所藏的一八〇一年本，是刻本中較早的。上面有一篇這書增訂人金豐的序，是甲子年，不知道確在什麼時候。一八〇一向上推的最近一個甲子爲乾隆九年（一七四四），我想恐怕就是這個年分，因爲《說岳》這部小說饒有民族思想，初刻後不久即遭查禁，見乾隆《禁書總目》。

《順治皇過江全傳》，封面題「己酉歲重刻」，亦不知何年。幸而這部書的版式全同另外一部《梁太師江南訪主》，後者爲道光三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則此重刻的年分恐怕也是一八四九年。

廈門文德堂版的《施公案傳》，是「道光庚辰夏鐫」的。但是道光根本沒有庚辰年，這個庚辰，實在是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這年陰曆七月，嘉慶皇帝死了，新皇帝登位，所以這年夏天刻的書居然有道光年號。

《貪歡報》（《歡喜冤家》）前有西湖漁隱一序，序文中有一句云：「庚辰春王遇閏，瑞雪連朝。」現在我們就來推測這庚辰是什麼時候。這部小說我們早就知道它是明末清初的作品，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刻本的《今古傳奇》，內已選有它的單篇。所以這個庚辰，必定是清康熙或上溯到明崇禎之間的一年。「春王」就是《春秋》的所謂「春王正月」，所以我們要找的一個庚辰年必須是陰曆正月是有閏月的，一七〇〇及一六四〇都合乎這個要求，但是它又必須在一六七五之前，所以，這個庚辰祇有一六四〇，即崇禎十三年是唯一的可能正確的年分。靠了這一句話，我們已可以確定《貪歡報》這部書是崇禎末年刻的作品，而不是康熙年間。



《好逑傳》的最早刻本（獨處軒本），封面有「癸亥年」字樣。這部小說，夏敬渠的《野叟曝言》第三十一回曾經引過，而夏敬渠是康熙間人，到乾隆時尚存。（約一六八一——一七四〇？）這書又稱明朝爲前朝，可見這部小說也是清初的作品。據西方的文獻紀載，這書一七一九已有不完整的譯稿帶到英國，一七六一已有英譯本出現。所以這個最早的刻本，不論它是那一年刻成的，亦必定在一七一九之前。最相近的一個癸亥年是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

樓外樓本《五美緣》，有寄生氏題於塔影樓的一序，署「甲申穀雨前二日」，不是什麼年號。但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三元堂刻的《爭春園》，亦有「寄生氏題於塔影樓」一序，爲「己卯暮春修禊日」。孫楷第先生說它「無年號」（《通俗小說書目》頁一五二），似難於考證。其實刻書之前兩年一八一九就是己卯，這推斷大約不會錯。那麼，《五美緣》序所題甲申，可以推知它是一八二四。有一種坊本《五美緣》的序不作甲申而作壬午，則爲一八二二。這兩個年分究竟誰是誰非，頗難辨明，然相差亦只有兩年。

《三合劍》這書，據孫目（《大寶三合明珠寶劍全傳》，孫著《通俗小說書目》，頁一九〇）有一八四八經綸堂刊本。倫敦藏本題「甲戌夏鐫」，假如以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做出發，上推到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便是甲戌，可是這却是錯誤的。因爲，我們又知道《三合劍》的故事情節是依傍另外一部小說《爭春園》的，《爭春園》的作者序撰於一八一九，所以這個甲戌必定要在一八一九之後，只是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的刻本。恰巧這書上面有英國博物院一八七五年十月六日的圖記，

對於我的推算亦並不衝突。

我這裏引的英國博物院的藏書圖記，對於調查有些書的時代，尤其是十九世紀初以來的刻本，是很有用的。例如：

會文堂本《西游後傳》（《後西游記》），我的推測爲約一八二一左右，館中的圖記爲一八五一年四月三日；

大西堂本《漢宋奇書》，我的推測爲約一七九六，館中的圖記爲一八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然有些書像蕙爾堂本《說唐平鬼全傳》，雖然書上有一七二〇的一篇序文，但這書的刻本形式，絕不像是清初的本子。如講這書本身的淵源，至遲也當在明末，但這與這刻本的時代不能並爲一談。館中的圖記一八六六年五月八日，爲同治五年，爲存疑計，我只能說這刻本不遲於一八六六。

自然，館中的圖記有大部分的年月是和書的版刻年分毫無關係的，如覆明周氏大業堂本的《東西兩晉志傳》，一八五一年才收入館中，明抄本《載花船》，也遲到一八九一入藏。這都對研究這些書籍本身的版刻或鈔寫本的歷史了無幫助了。不過，做爲是反面的證據，例如說某書不可能遲於某年，否則便和圖章所透露的入館的年分矛盾，這些地方，我想館中的紀錄還是有很高的可靠性的。

## 辨別一書的真偽

客觀地說，任何作品本身是無所謂真偽的，因爲它都客觀地存在着。這裏所謂辨真偽，指的是

像依託作者、偽造序文、假托時代這一類的事情，有些甚至是一書的真正作者有意蒙蔽當時或後世的人們。

《水滸後傳》的作者陳忱，本是清初人，但是因為他懷有滿腔的反滿清思想，想藉着小說來洩憤，却不願別人知道，所以這書的署名爲「古宋遺民」，並且還在卷首的《論略》說他「當去施（耐菴）羅（貫中）之世未遠」。另一部清末的小說《兒女英雄傳》，作者文康，他是道光咸豐間的人，却在書前僞託了一篇一七三四、一篇一七九四他人撰的序文。但是他的一七三四的序文中提及《紅樓夢》，書中又提到《品花寶鑑》中的人物，《品花寶鑑》是一八四九才刊行的，這些地方，就不自覺地露出馬腳來了。

以上兩個例子，除了《品花寶鑑》刻於一八四九這個年份的考據之外，都是胡適之先生做的小說考證中的定論。（《胡適文存》第二集，卷二《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三集，卷六《兒女英雄傳·序》）現在，下邊我也姑就倫敦藏書中有關的作品，檢討一下它們這一方面的糾葛。

明劍嘯閣本《東西漢通俗演義》是從一六一二周氏大業堂刻的《西漢通俗演義》及《東漢通俗演義》這兩部書來的。劍嘯閣本有袁宏道的一篇序，但它所依據的一六一二大業堂本這書却沒有這篇序文。

袁宏道是晚明的一位傑出的文學家，而且，可能跟小說的出版事業中人有些往還，但是他在一六一〇就死了（見《明史》卷二八八），而且這篇序文文字殊爲拙劣，我以爲只是書坊中別人托名代撰的東西。

清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褚人穫編的《隋唐演義》，序文中擄及一位明末到清初的名士袁籙庵（于令）——這人也曾撰一部同性質的小說《隋史遺文》——曾經借給他一部罕見的舊書《佚史》，那裏面有一個哀感頑豔的故事，說唐明皇和楊貴妃兩人，實是隋煬帝及其所愛的朱貴兒轉世，所以褚人穫就把這一段兩世因緣的故實，吸收進他的《隋唐演義》裏面。這故事果然很動人的。《佚史》是唐代大中年間（八四七——八五九）的一部著作，宋代已佚，後來也未嘗聽說起，何以袁于令會有此書呢？袁作《隋史遺文》並未利用他這段纏綿的故事。袁和褚的時代照我最謹慎的推算，大約相差也要六十年，實際上恐尚不止此。袁氏的《隋史遺文》成於一六三三，褚氏的《隋唐演義》刻於一七一九，這兩個入是否會有像褚所說的那樣的交誼，很可懷疑。但是褚為什麼要提袁于令呢？如果說是因為袁是名士，並且又有《隋史遺文》的小說在前，大家又是長洲（蘇州）同鄉，不妨標榜，這就沒有什麼值得驚訝的了。

一八七〇年翠隱山房本的《飛龍全傳》，有著名的學者杭世駿一七九七（嘉慶二年）作的序文，同書又有作者吳璿自序，也署一七九七，這是不確的。倫敦藏世德堂本此書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崇德書院刊本，吳序皆署一七六八（乾隆三十三年），故序中所言之己巳、戊子兩年，所指為乾隆十四及三十三年（一七四九，一七六八），這在序中其他文字看來也符合的。但翠隱山房本出得雖遲，却擅改了吳璿序文的年份，以便和後來加上的杭世駿序時間一致，却不知道這樣一改，時代移後，變成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吳序中所說的己巳、戊子，不得不由一七九七上溯，而戊子遂變成二十九年（一

七六八）、己已成了四十八年前（一七四九）的事情了。這恐怕是擅改序文的人所不曾預料的。杭世駿在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已去世，這篇嘉慶二年的序也是偽託。

類此的情形，還有一樁。一八〇六會元（堂）版的《粉粧樓》，有一八〇五年竹溪山人一序，它的本身是看不出什麼毛病的。但此書另有一七九七寶華樓刊本，比這本子早八年，而在這個會元堂本上面的竹溪一序，却絕對沒有提到它本身以前還有更早的其他刻本。寶華樓刊本上面的年分，也不像是假的，因為在當時早幾年或遲幾年對誰也不發生影響，沒有作假的動機。我只有一個推理，就是，這序文的撰寫年月，也許原比一八〇五早，但是到了一八〇六重刊時，利用了舊序，却把它的年分移後了，只做爲是刻書的上一年，以便和梓行的時期更加接近。

竹溪山人這篇序，還可以說是模仿褚人穫《隋唐演義》前面刊的一篇明正德三年（一五〇八）一位尚書林瀚所撰的舊序文作的。《粉粧樓》也是號稱爲羅貫中的舊著，兩序推崇的對象在這一點上相同，故而文字上也模仿得與前人作的畢肖。讀者如果比較所引的原文，一定不會說我在這裏厚誣古人：

林瀚序（託撰於一五〇八）

前寓京師，訪有此書，求而閱之，始知實亦

羅氏原本……

予既不計年勞，抄錄成帙，又恐流傳久遠，

竹溪山人序（託撰於一八〇五）

前過廣陵，聞世俗有《粉粧樓》舊集，取而閱之，始知亦羅氏纂輯……

余故譜而敘之，抄錄成帙，又思流傳既久，

未免有魯魚亥豕之訛。茲更加訂正，付之剞劂。

難免魯亥之訛。爰重加釐正，芟繁蕪蕪，付之剞劂。

## 一位烈婦的故事

我在他處提過不止一次的古吳三多齋刻本《古今列女傳演義》，前面有「東海猶龍子漫題」一序，像是依託撰人爲馮夢龍。馮在明末刊刻小說的聲譽是極大的，《三言》之外，像補撰《北宋三遂平妖傳》，重編《列國志》，皆其犖犖大端。這部《古今列女傳演義》，說是他所撰的，應該也有可能。

但是這部書敍及清初的一位徐州海烈婦事。此外，另外還有一部巴黎藏的《海烈婦百煉真傳》，但是這部書敍及清初的一位徐州海烈婦事。此外，另外還有一部巴黎藏的《海烈婦百煉真傳》，小說共十二回，題三吳浪墨仙主人編輯，序末有「墨憨」一印，也作爲是馮夢龍撰的，因爲這幾個名字都和他其他已知的筆名相像。然而這兩部書實在都不是他的東西。

海烈婦一案是康熙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一六六七）發生的事情。她和丈夫陳有量都極貧窮，而海氏貌美，頗爲惡人所垂涎。她被騙附搭惡徒的船，在返徐州的歸途中深夜遭遇強暴，遂自縊死。舟子藍九廷知情，深覺不平，密報官署，遂成爲清初一大案。此事並見《清史稿·列女傳·陳有量妻海氏傳》、《碑傳集》卷一五三、《烈義·上》、《國朝賢媛類徵初稿》卷八所收任源祥《陳有量妻海氏傳》。《清史稿》記此案無年月，上引的日期，見於任傳文中，當無錯誤。但是馮夢龍死於一六四六，也是不錯的，距此已二十年，自然兩書都只是慕名書實的依託。

## 論小說史上的若干問題

除了它的版本時代、撰述年月、序文真偽、作者是否依托這些問題之外，我們對於一部小說，還有幾方面重要的問題可以研究的，是故事的演化、版本的淵源嬗變、小說中的方言、作者的生平經歷或傳記，以及從文學史的演變看來某些作品爲其他作品的藍本、某些作品爲其前後兩種其他作品之間的連鎖或過渡性質的產物，這些問題通常都爲編著小說史或小說史料的人們所注意。在我的《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附錄的若干篇中文書目提要裏，雖然爲其成書的性質所限，談及的書本是有了一定的限制的，但牽涉所及，也有不少這一類有關小說史上的問題。

### 故事的演化

因爲中國通俗小說的興起，北宋以後民間說書人的宣講流傳曾經發揮了最大的作用，所以差不多在清代以前，完全是作家個人創造的故事是很少的，每一個故事經過說書人口頭的創造，逐漸修改，流傳到其他各地，很可能又由他地的說書人增添了一點新的材料。其後，當這些故事從口頭流傳漸變到刊印爲「話本」，爲有標目、分則、分章回的長篇著作的時候，又不免經過若干坊間書賈和他們聘來編書、批書的讀書人的竄改削潤。因此，我們也往往能够把一部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小

說，追溯其故事在它以前其他的著作中所留下的痕迹。但也不止是極著名的作品，一般地說，差不多在這些由宋代到清初的通俗小說中，有大半的著作都是如此。因此，一篇書目「提要」的寫作，在這方面也應該儘可能滿足讀者的需要。

現在讓我提出一部倫敦藏本的《醉菩提全傳》做例子。自南宋以還，濟顛和尚道濟的傳奇性的故事已經逐漸成了定型了，到了明代，它已被刻畫為短篇小說中的主角，而到清初著者題為「天花藏主人」的這部二十回的長篇《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才成了家絃戶誦的讀物。幾百年來，民間對於這一位飲酒喫肉、遊戲人間的活羅漢、活菩薩的信仰膜拜，這部小說的魔力也有極大的貢獻。這部書，有的版本也題為「西湖墨浪子偶拈」，又是影射明末的馮夢龍。

現在我們追溯天花藏主人這部書，立刻就可以想到明末張大復的《醉菩提傳奇》，這個劇本一定會經給小說的撰寫人以很大的影響的，不僅題材相同，連題名都沿襲用了。天花藏主人據我的考據（見本篇下文），也是明末到清康熙間的人，那麼，康熙間刻的《西湖佳話》中關於濟顛的記載，和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出版的、署名西湖香嬰居士（王夢吉）重編的《麴頭陀新本濟公全傳》，他也不會不加留意的。所謂《麴頭陀》，無他，也等於是《醉菩提》的另一雅稱罷了。這都是明末清初這個階段的著作。

實際上，在一五六九刻的沈孟梓述的《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其實是一篇短篇小說，已經是濟顛故事小說化的成果了。在這以前，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間刻的、晁琛的《寶文堂書目》



中記錄有題爲《紅倩難濟巔》的這個話本，現在已佚失。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十四，也提到濟巔的事蹟及題爲《濟巔》的一個話本，可能指的就是《紅倩難濟巔》也說不定。

再上溯到宋朝，最早的文獻祇是居簡和尙《北澗文集》卷十所收的濟巔圓寂後的一篇《塔銘》，塔內埋着他火化後的剩餘的舍利。濟巔這個人是真實的。但是，由《塔銘》的記載直到後世的《醉菩提全傳》，這裏面既有僧侶的原始記錄，又有文士們的掇拾舊編寫成筆記，又經過說書人的改編和改寫，一直到明末又變成到處演唱的劇本，最後才又由書坊中人延聘文士彙集而成二十回的長篇小說，這中間已經經過四百年的變遷了。

濟巔的這一個故事，經過的時間雖久，事蹟和靈異的增益雖多，但故事的輪廓是沒有很大的變動的。其他的故事，後世的記載寫得很有人情味的像著名的白蛇和一個書生許宜戀愛故事，一八〇六年刻的《白蛇精雷峯塔記》及明末所刻《三言》中《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的那篇短篇，都是纏綿動人的。然而，稍早些的紀錄，原始的情節便沒有那麼美化了，敢情這條白蛇在最初的記載中實在是一個吃人的精怪。像十六世紀中刻的《清平山堂話本》這部話本總集中所收的《西湖三塔記》的白蛇，便是這樣在杭州化身爲白衣娘子出來迷人，成功後便結果了他再換新人的一個慘酷的精怪。這故事的來源也是宋代。但是到了明末，它已經變成人和蛇發生真實的戀愛，再經過文士們像《三言》的編者馮夢龍自己這些人的修飾和美化，這個故事到今天還很真實地活在許多人的心裏，完全沒有早期那種慘酷和粗獷的痕迹了！